

## 中產階級的歷史建構：從「新秩序」到新黨

陳儒修\*

郭志榮\*\*

### 摘 要

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主題來自一九九四年底，省市長選舉結束之後，新黨所舉辦的一個後續活動，活動進行時井然有序，活動結束時現場開始混亂，工作人員帶領群眾呼口號，排成長龍等待簽名，令人想起小虎隊所舉辦的一場演唱會，小虎迷也是在工作人員帶領下呼口號，平息騷動。把這兩個活動相對照，當時在場的新黨支持者——也就是自我標榜為中產階級者——為何會與小虎迷有一樣的行為？同時，由於新黨自稱（或被貼上標籤）為「小市民、中產階級」政黨，因此本報告探討中產階級的歷史建構意義，「中產階級」這個符號如何被銘刻（inscribe）入政治選舉論述，以及該符號如何被新黨所引用，藉由傳播機制而賦予特定之政治、經濟與意識型態意義。

---

\* 作者簡歷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副教授

\*\* 作者簡歷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

## 前 言

我們的研究興趣來自 1994 年底省市長選舉結束之後，新黨所舉辦的一個後續活動。活動進行時，新黨支持者井然有序地坐在台下，當活動結束時，現場民衆爭相向前，要新黨成員簽名，場面開始混亂。此時，工作人員立即高喊「建立新秩序，大家排隊簽名」，結果民衆聽到廣播，立即排成長長的蛇陣，輪流上前等候簽名。（中國時報，1994/12/12）

這個現象令人想起以前小虎隊所舉辦的一場演唱會。跟往常一樣，小虎隊久久沒有出現，台下的虎迷們開始感到不耐煩，漸漸出現騷動與不安的情緒。台上的主持人看到這個情況，立即說：「我們小虎隊迷們是——」，結果台下大大小小虎迷們異口同聲回答：「重榮譽，守秩序！」於是又安靜下來，大家再度乖乖地等小虎隊出來。

把這兩個活動相對照，我們想問，這些新黨的群衆——也就是自我標榜為「中產階級」的這群人——為何會做出跟小虎隊迷一樣的反應？同時，由於新黨自稱（或被貼上標籤）為「小市民、中產階級政黨」，因此，本報告想要探討中產階級的歷史建構意義、「中產階級」這個符號如何被銘刻（inscribe）入政治選舉論述，以及，該符號如何被新黨所挪用，藉由傳播機制，而賦予特定之政治、經濟與意識形態意義。

## 壹、中產階級的界定

當今文化批判所關注的三大主題——性別、種族、階級，其中只有階級一項可以視為非「與生俱來」的：一個人的性別屬性，以及其族群身分認同，基本上從生到死不會改變（或很難改變），而階級則是由歷史建構而成。

除了最原始的功能論調，認為階級不平等為人類存在的先決條件外，一般界定階級的方法著眼於誰擁有武力、法律、經濟等權力，或擁有行使權力的工具（如：軍隊、學校、銀行等），以做為區分的標準。也有論者從心理層面出發，認為階級是一種意識與理念，或是自然發展而成，非個人所能控制，如黑格爾；或認為此種階級意識，會

依循社會演進而改變。

Albert Szymanski (1983: 5) 則就馬克思主義所主張之生產關係與生產模式等概念，來決定階級意識。馬克思與恩格斯界定布爾喬亞階級為「現代資本主義階級、社會生產工具擁有者、受薪勞動力的雇主」(Marx and Engles, 1883)。依此定義，此種經濟佔優勢、又握有國家機器與文化生產工具的階級，正與工人階級相對立，因此與一般認定資產階級或資本家相同。而夾在此兩大階級之間，帶有過渡意味的階級，方為中產(中間)階級。(然而「中間階級」的概念原就封建社會貴族—農奴之對立關係而形成，由於資本主義的演進，貴族與農奴之對立被資本家與工人的對抗關係取代，中間階級的觀念同時被挪用過來。也有以「小資產階級」來形容。本報告則用中產階級做為通稱。)照這個觀點，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，在於他能決定生產過程與內容，控制生產勞動力，以及分配利潤。換言之，資本家能決定生產勞動關係。然而，步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，由於中產階級的出現，原本資本家：工人=剝削：被剝削的單純二元對立關係產生變化。再度區分的結果是：所謂資本家，乃擁有生產工具，並能決定生產過程與內容；相對的，工人則純粹出賣勞動力，依照資本家決定的生產程序工作。夾於其間之中產階級則扮演一微妙的角色，一方面雖受雇於資本家，卻擁有部份的工作自主權，另一方面則代表資本家，指揮與監督工人。

雖然如此，中產階級仍然面臨「定義不明」的困境，從私人公司高層主管、政府官僚與自雇業者，到專業人員與半專業人員(如護士、技術師、基層警員、各種經紀人等)，到工頭或直接管理工人的下級主管，皆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。其間出現的勞資關係，從自雇到被公私企業雇用者都有，範圍過於廣泛。

如就中產階級之社會功能與工作內容區分，可以歸納出下列五項：

- 1) 生產與延續資本主義文化與意識形態，如：社會科學家、文藝人士、社工人員等。
- 2) 監督與指揮下層勞動力，如：工頭。
- 3) 直接投入生產行列，如：小農與藝術家。
- 4) 管理與運作資本(轉投資)，如高階業務員、銀行行員、會計人員等。

5) 一般社會服務，如：醫生、律師等。

而一般人所認定的「中產階級」，則直接指涉下列三種人：

- 1) 在公私企業擔任行政人員，執行企業主指令，並指揮監督其他員工。
- 2) 負有執行業務責任之上班族，在工作中有相當的自主權（使其增加工作效率），卻無權干涉或規定他人的工作內容。
- 3) 傳統自雇業者，不受公私企業雇用或控制，有較多的勞動自主權，相對也無權干涉或規定他人的勞動內容。

最近的趨勢顯示，中產階級的界定，受到新科技變革的影響很大。整個勞動生產過程不僅重新規劃，甚至於與大眾媒體結合之產銷計劃（廣告），成為工作重點。因此，中產階級的「任務」也有所變化，原先直接監督工人的工作內容，如今被視為（藍領）工人階級要做的。而新中產階級則著重在提供技術指導與協調（也就是不必直接面對工人）。

這種新中產階級所建構的階級意識，也與以往不同。他們是以技能、學歷、文憑所累積的人力資本，而建立的新興社會階級（蕭新煌，1989：6），具有高比例的自我認同（即認同自己為「中產階級」）。同時，鑑於工人階級的領域不斷擴大，為免於自己也「淪落」為工人階級，只好努力參與工作。他們透過外在物質事物，如房子、車子、甚至妻子、孩子等，來凸顯他們的中產階級屬性。為了確定有個美好的未來，他們可以壓抑個人需求與慾望，拼命累積資本。他們本質是保守的，認為社會提供的機會人人均等，要努力才會有收穫，所以窮人都是不努力的結果。他們對大企業與政府不滿，認為他們應有的福利被剝削；他們也懷疑任何的社會變革，認為只會造成社會不安定。因此，他們會期望有「第三條路線」，打破大企業壟斷的情況，同時阻止任何社會進步變革的動力。

## 貳、西方中產階級的歷史回顧：德國經驗

遠古以來，土地決定階級，地主或貴族控制著為他們耕種的農奴。但是當對外貿易開始興起時，出現了不屬於貴族、也不是農奴的中產階級。他們從商業行為中獲得大量的金錢，而隨著都市的興起，他們走入大都會，變成了商人，或成為技術官僚，協助在位者管理國家。

就歐洲而言，由於各國政治與經濟變革的契機不同，中產階級出現的情況也有所差異。Blackburn（1993：3）比較英、法、德三國之後，有以下的說法：英國的工業革命給該國中產階級的成長，注入強勁的衝力；法國則由於持續不斷的政治革命，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成為中產階級帶領一般民衆，要求政治改革的口號，從而強化中產階級的權力與影響力。德國的情況則稍有不同——是教育促成了德國中產階級的興起，Blackburn 稱之為「閱讀革命」。德文中的 Bildungsbürgertum 便是指這群受教育的中產階級（有別於累積財產而形成的傳統中產階級）。他們從 19 世紀起，透過學歷與考試等文官制度，開始進入國家機構，成為建設日耳曼民族國家的主力。

德國中產階級的特色，在於極度相信理性與「人定勝天」的道理，他們認為勤奮工作必有收穫。與其他的中產階級一樣，他們也非常重視自己的獨立自主，而這種獨立自主是建立在足夠的經濟基礎、充分的時間與金錢來規劃未來，以及完整的教育背景。他們同時是保守的，並且懷疑藝術與社會的各種「運動」。德國中產階級對家庭的重視，被視為是整個社會的典範。家庭的觀念可以延伸到工廠，所以每個工人都要如同家庭的一份子，守本分勤奮工作，以獲得他人的尊敬。更特別的是，這種家庭的觀念，在社會上引發出無數的「志願義工」組織（Blackburn, 1991：11），從發放救濟品到防止虐待動物都有，自然強化中產階級的社會資源與地位。

由於這些志願義工組織同時也是中產階級聚會的場所，自然有其排他性，於是造成德國中產階級刻意區分「我們」與「他們」的特性。這裡的「他們」，原本指的是貴族階級，中產階級的勤奮努力與自力更生的本質，使得他們看不起貴族們與生俱來的有錢有閒。以後的「他們」，則是工人階級，因為後者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力，以及要求變革的呼聲，都與中產階級安定、保守的心態相抵觸。

比起法國自 17 世紀以來就有的政治革命，德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成熟度的確不高。雖然他們通過考試，可以成為政府機構的技術官僚，但是並沒有實質的決策權。即使如此，他們還是相信，強大的國家力量，以及德國的經濟繁榮，是他們的功勞，並且他們以此肯定其階級屬性。這裡也就帶出一個歷史公案：有關德國中產階級與納粹的關係。

根據 Childers（1991：320）的研究，德國納粹黨的政治訴求主要有以下兩個方向：首先，他們強調對日常生活困難的關切，特別是凸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，威瑪共和經濟政策的失敗，以

及隨之而起的公會組織運動，所帶給「老百姓」的生活焦慮。這種訴求，加深中產階級害怕自己會被剝奪原有的生活形態之恐懼。其次，納粹允諾，在執政之後將立即採取行動，以恢復法律與秩序，也就是建立具有軍事形態的「新秩序」。中產階級面對著可能被「無產階級化」的危機，同時又不滿執政當局與大企業忽略他們的福利，自然轉向納粹，視納粹為具有正面意義的政治改革運動者。除了上述因經濟危機，威脅到中產階級社會地位，納粹所主張的民族主義，以及壓抑個人慾望，「一切為明天／一切為領袖」的口號，都與中產階級的性格投合，於是成為納粹徵召黨員與獲取選票的來源。於是從1928年到1930年，短短的兩年間，納粹的支持率從2.6%一躍為18%（Childers, 1991: 324）。

矛盾的是，納粹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（中產）階級屬性的政黨，他們期望能超越傳統政治黨派在社會地位、選區與階級之分野，吸收從上層到下層的民衆。Hamilton（1982）的研究顯示，納粹黨的確握有從藍領工人階級到富有的中上層階級的選票（並包括公務員的支持）。但是納粹並未真正成功地整合工人階級，支持他們的藍領階級民衆，仍以手工業、小規模營造業等較具有勞動自主權的業者為主，而非傳統的工農群眾。

除此之外，納粹對中產階級的訴求值得注意。他們除了建構特有的政治儀式、符號與語言外，還針對不同的中產階級職業，如上班族、公務員、藝術家等，使用不同的訴求口號、傳單與其他文宣，甚至依不同的職業對象，而有不同的政治集會。這個策略的確打亂了當時的政治生態，不僅模糊了中產階級的政治屬性，對其他政黨而言，也不再可能提出單一政治訴求，以統合多樣的中產階級團體。

總之，德國納粹的突然竄起，在於以下的優勢：尚無執政的經驗，所以並沒有失敗的前例；不須與任何特定地區團體、職業成員認同，可以免於「執政黨＝財團代言人」的類似指責；更重要的是，納粹的議題設定，可以右至「國家民族的榮辱」（民族主義），左至「弱勢團體的福利」（自由主義），相互靈活運用。但是，Childers在同一研究中也指出（334），1932年之後，中產階級對納粹的支持開始下滑。這些流離的選票並不能解釋為反納粹情結的出現，只是顯示了先前納粹選舉勝利純為一短暫而脆弱的現象。當然也是因為納粹遲遲無法執政，使得他們試圖恢復法律與秩序的行動，不能展開。加上不斷升高的政治暴力事件，喚起中產階級反對激烈變革的保守心態。正當納粹選區逐漸瓦解崩離時，命運之神卻將希特勒推向執政之路（

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為總理)。他也就把德國人民——不管是不是中產階級——帶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深淵。

### 叁、台灣的中產階級

台灣的中產階級是否形成，一直是學界熱衷討論的問題。在1985年的一場學術研討會中，瞿海源以教育程度、職業分類兩者作為客觀標準，判斷台灣中產階級已然興起，並推估中產階級的人口比例，應佔14%—21%之間。但行政院研考會在1983年所作的一項調查研究中顯示，約有56.9%的受訪者，主觀上自認屬於中產階級。(魏鏞：1985)

雖然主觀上的認定與客觀上的認定不一定存有必然關係，但兩者所存在的差距，卻可提供我們思考下列問題：

- 一、客觀上以教育、職業、及所得的標準，是否能精確區分出中產階級，以及中產階級是社會實存現象，或學者界定出來的結果？
- 二、主觀上偏高的自我認定，是台灣特有現象、抑或成為一種世界的普同意識？

在台灣歷史進程上，工業化的前後期，是台灣新、舊中產階級的分水嶺。在工業化前期，台灣多為外來勢力之統治，社會深受殖民母國政策之影響，中產階級的存在，也多半為中下階層，其性格也多半傾同於農工的普羅階層。而中上階層的中產階級，部份是政治上的附庸，如日據時期約八萬戶的地主階級(小資產階級)(南方朔，1994：195)，其延續到國民黨來台初期；部份則是外地移入台灣的專業中產階級，如日據時期日人引入的技術專家，以及國民黨來台所帶來的文職官員。在政治的附庸以及外來的移入，工業化前期的台灣中產階級，本質上，是與台灣疏離、隔閡的。

二二八事件的發生，更是使台灣本土中產階級受到極大的摧殘，隨後威權政體的實施，也使得台灣本土中產階級難以正常發展。所以，在工業化前期，台灣中產階級的面貌，如同布爾喬亞階級般，一直是模糊而難以辨認，自我生成的意識也是呈現一種斷裂、不連續的面貌。

工業化後，在政治勢力逐漸的退卻，經濟、社會力量的興起，台灣在經濟快速成長之後，社會也開始呈現不同面貌，而形成台灣新中產階級快速興起的原因，可歸於：1.教育普及；2.都市興起；3.半邊陲資本主義的運作三大主因。

在教育高度的普及化，使人們至少有九年的受教年限，而教育作為一種階級轉換的管道，更成為文憑主義的根本原因。台灣進入一個高學歷的社會，這也是新中產階級形成的主要原因。黃毅志（1994：265）所作的一項研究也發現，在主觀認同自我為中產階級上，教育（高中以上）是最主要因素。

另外，高學歷的人才，也形成一種專業階級，有別於以往小農、小商人、獨立工作者的舊中產階級。他們是一群受僱階級，在工作上扮演的角色，也由人事的直接管理（如工頭），轉移成為工作事物、資訊的處理（專案經理、新聞記者）。

在都市變遷上，台灣隨著工業化來臨，都市的興起，也是脫離傳統，開始型塑一個新階級的契機。在國民黨來台初期，台灣都市數目共有十一個，人口數僅佔總人口的21.3%，但至1983年，台灣都市數目共有27個，人口數佔總人口的50.3%，若合併都市郊區及附近鄉鎮，都市人口數將是更為可觀。（蔡宏進：1985）都市的人口集中化，也形成一種新集體性格，每個人在生活上是息息相關，在心理上卻是彼此疏遠。自我優越意識的存在，卻基於生活的侷促，及內團體的缺乏，卻不得不依賴來自國家的保護，這種矛盾的性格，正是這群都市新中產的最佳寫照。

在中產階級的興起中，社會運動的面貌，由早期的農運、工運，擴展到都市運動，如消費者保護運動，及無住屋蝸牛運動，這些運動的屬性與早期工運、農運並不相似，除了訴求是針對中產階級自我利益外，也較有效運用組織及文宣的力量，具有明確的目標、策略，以及從體制內，尋求立法途徑的改革運動。張曉春（1989：186）指出，許多中產階級對於勞工運動或環保運動並不熱衷，其因是這些運動有害經濟發展。

中產階級懼怕經濟衰敗，正是新中產階級的內心深處恐懼之所在。新中產階級的興起，有別於早期土地資本階級，或自力工作者，他們大都是受僱員工，在企業、機構中擔任主管，他們必須運用自己的文化資本，去換取生存所需或作為階級晉昇的工具。

台灣作為一個半邊陲資本主義國家，在農業——工業——商業的轉換過程中，也正符合台灣社會由小農——勞工——中產階級為社會主體的過程。至工商業的高度發展，產業結構由早期加工區的密集勞工，到今日科學工業園區的專業人員，以及大企業經理人員，他們依賴資產階級提供工作機會，也為資產階級創造財富。在生存的條件下，他們不得不與資產階級形成一種共生關係，或者成為資產階級最有



力的支持者。

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，不可忽視的是一群提著皮箱到處談生意的中小企業，在六、七十年代，他們成為台灣經濟的主力，也形成有別專業中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，這是邊陲資本主義體系的獨有特色。作為經濟邊陲國度，他們透過快速的機動力，法令上的便利（如低稅率、低工資等），負責吸納來自資本核心國的金融，造就了巨大的外匯存底。但隨著國際資本的快速流通，以及跨國企業的大肆擴張，台灣中小企業在面臨缺乏雄厚資金對外競爭，以及國內市場的日益開放，都使中小企業面臨新的危機。

而不論是教育普及、都市化、或是資本主義運作的結果，都可以用馬克思所謂的「自在階級」（class-in-itself）來說明，這些僅能代表中產階級在台灣的结构面向。然而因主觀意識而形成的「自為階級」（class-for-itself）之概念，在台灣則面臨界定上的困難。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，使得台灣的中產階級呈現一種獨特而多樣的面貌。在早期，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，台灣本土中產階級的主體意識難以發展，甚至呈現一種斷裂現象；而晚期，由於高度的資本化，以及快速地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中，台灣的中產階級也如海綿一般，全盤接受西方現代化的影響，中產階級的經濟面向被凸顯，新中產階級也追尋西方價值的判準，形成一種混亂交雜的中產情趣。

台灣民衆對中產階級偏高的自我認知上，更顯出民衆對中產階級意義的混淆，以及意欲成為中產階級的迷思，是如何深刻地烙印在民衆心理。如《天下雜誌》在工業重鎮的高雄所做的一項調查中，竟然有高達 94% 的受訪者自認為是中產階級，這個結果與前面提到研考會的數據，形成有趣的呼應。

## 肆、中產階級與新黨

1993 年 8 月新黨宣布成立，其宗旨第一條即為「讓人民有更好的日子過」，並自許為小老百姓的代言人。姑不論新黨是國民黨眼中「迷失的小孩」，或民進黨嘴上的「外省黨」，新黨在台灣政治市場上，的確投下了一個重大變數。新黨自許在「三年三階段目標」的計劃下，在 93 年縣市長選舉中，促使二黨不過半；進而在 94 年省市長選舉中，全力爭取一席；以及 95 年立委選舉中，將促成三黨不過半。新黨力求做一個「有力的第三黨」，而在針對選民策略上，也試圖拉出第三邊，形成國民黨——資產階級；民進黨——無產階級；以及

新黨——中產階級的策略。

新黨這種「第三哲學」，充分展現在其「反金權、反暴力」的口號訴求上，指責國民黨為金權黨，民進黨為暴力黨，而金權與暴力的訴求，正是直指中產階級的痛處；厭惡資本階級的腐敗、恐懼無產階級的暴亂。

其「新秩序」的哲學正是針對中產階級對於社會迷亂的心理恐懼，所制定的一套行動策略。在新秩序的口號中，隱含了中產階級的優越心態，排除社會亂源，以建立一新道德觀。其建立新秩序如周處除三害；一除「金權勾結」，二除「台獨」，三除「社會苟安心態」。（新黨雜誌20期：社論）

Bell（1989：267）曾對西方先進國的福利政策作觀察後指出，公共福利的支出，加速通貨膨脹，而作為都市中產的受薪者，最易感受到這種通貨膨脹的壓力，更厭惡公共福利支出所受惠的中下階層。Bell指出，一場新的階級戰爭即將爆發，戰爭雙方並非雇主和企業中的工人，而是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。戰場則是國家預算。

新黨的新秩序觀，基本是建立在這種經濟利益的衝突之上，試圖建立一個符合中產階級利益，避免額外負擔，反對任何中下階層藉由對社會公義的要求，所從事的任何脫序行動。新秩序所要達成的，正是舊時代那種階級嚴明安排，人們各安其位的假象。

而新黨的新秩序作為一種道德訴求，亦是符合中產階級的懷舊與求新的矛盾性格。在歷史上，中產階級是工業化後而逐漸明確，中產階級在追求地位提昇、財富累積之時，同時也忍受著傳統中人際網絡親密相依感覺的消失，而都市犯罪率的提昇，犯罪年齡的下降，都加深其內心的憂慮。新保守勢力的興起，根基於中產階級這種追夢的心理，他們對於經濟抱持開放態度，但在文化上卻是一種保守心態。他們希望在經濟繁榮的同時，也能夠維護傳統的宗教與道德觀念。（李連江，1993：82）

新黨的新秩序所提供的道德幻象，正是這種「家」的感覺，每一個人都是家庭中成員，從「台北新家」成立，到黨員自我形成的營銷網絡（新黨雜誌15期：頁底廣告）。或者，運用親屬稱謂來彼此稱呼（如老爹、伯伯、老弟等）都顯示出「家」的觀念，在新黨內扮演重要核心精神角色。而這種「家」的感覺，正是提供中產階級一個絕對的道德觀，一個反對任何文化變革的鐵閘門，或未來美麗國度的影象。新黨這種「家」的感覺，也正是中國傳統「家族」的觀念。新黨將這觀念與中產階級的幻覺結合，巧妙轉換成為國族認同，讓中華民國

成為新秩序的國度，是老年人的故土家鄉，是年輕人的未來樂園。

新秩序在經濟、文化層面有其內涵，作為政治口號，更有其強烈意圖。新黨要獲得政權，或者進行「保衛中華民國」，在現今民主運作的模式下，必須走向民衆，而無法透過宮廷革命來掌握權力。新秩序的提出，正是巧妙地結合經濟利益來建立一國族認同，進而達到掌權執政的目的。新秩序所提供的，是一個安穩的社會環境，以及有力的國家，其目的在於對無產階級激進的壓制，透過新秩序所能提供的一個利於經濟繁榮的社會，來換得中產階級選票的認同。

相對地，在中產階級的觀點上，面對無產階級要求的日益升高，而他們又無法、亦不願與其進行正面衝突，因此，寄望一個強有力政體的來臨，新黨與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結合，正是產生在這種共生共利的關係之上。

一旦新黨對權力產生貪慾，也是與中產階級矛盾凸顯之時。因為尋求執政必須贏得多數的選票，在這些選票的政治訴求中，新黨必須不斷地將許多階級（如中下、中上），透過中產階級的模糊性，納入中產階級意識的建構之中。但在實際的政策推行上，這種作法會壓迫到原有中產階級的利益，或者讓新納入的中產階級看破這中產假相，進而形成一種分裂。

社民黨的朱高正、勞動黨的王津平、高雄王家的王俊雄陸續加盟新黨，正顯示出新黨由中產向農、工、資產擴張的趨勢，其目的除了運用該加入黨員的原有選民，以獲得選舉席次外，同時也顯示新黨無所不包的旺盛企圖。而這種吸納能力，也就正是新黨的真正走向——作為一個全民政黨，邁向執政之路。中產階級的訴求，僅是作為晉昇的階梯。這種背離原有群眾基礎模式，在民進黨身上發生於與社運團體的決裂（中國時報，1993/5/29）；而新黨將發生於與中產階級的衝突上。

新黨在這種有意無意的階級屬性認知模糊（小市民？小老百姓？中產階級？）（楊笠：32），一旦擴大權力範圍，就可能失去中產階級的不利因素之下，其解決之道，將是拉高國族認同的危機意識，以國族危機來穿透階級藩籬，透過中共「三點聲明」的緊箍咒，緊緊地壓制著島上所有的居民，無論是中產、資產或無產。

從歷史演化角度來看，中產階級與新黨並無自然生成關係。新黨作為一個國黨的分裂者，由早期的「毀黨、救黨」到現今的「自立門戶」，新黨所尋求的，也只是一個政治上可運用的籌碼。而中產階級意識的普及化，也正有助於新黨將政治的論述，由台灣人／外省人的

族群雙邊關係，轉化為資產階級（金牛）／中產階級（小市民）／無產階級（暴民）的三邊階級關係，跨越在族群刻板印象上，新黨身份背景所帶來的困境。

因此，新黨自許為一個階級政黨，作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「新台灣人」代表（楊泰順：28）。新黨的政治發展軸線，正是強調階級以跨越族群問題，建立新國族以跨越階級局限，而新黨正欲扮演新國族引路人的「彌賽亞」角色。（左又新：46）

### 伍、從「新秩序」到新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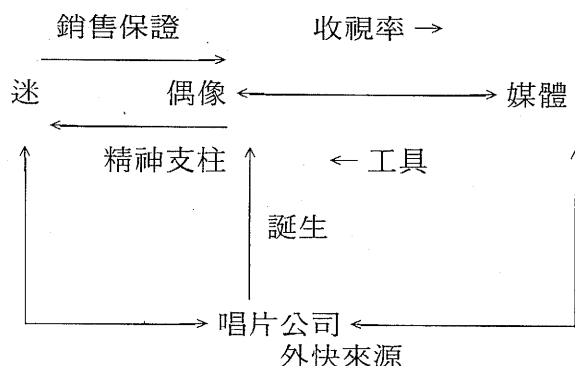
新黨作為一個都會型中產階級政黨，其崛起透過媒體的推波助瀾，居功不小。新黨本身相當注重媒體之運用；從突破大眾媒介的封鎖，到電腦網路的運用，正如趙少康所言：選舉如同一場行銷戰爭。

在新黨之內，不乏媒體專才；從趙少康、丁庭宇、周荃到朱高正等，他們不是媒體專業，就是媒體寵兒，他們深知媒體的運作方式，以及媒體的快速擴散能力，而媒體的運用能力，也正是中產階級、都市居民所具有的獨特能力，甚而成為一種生活本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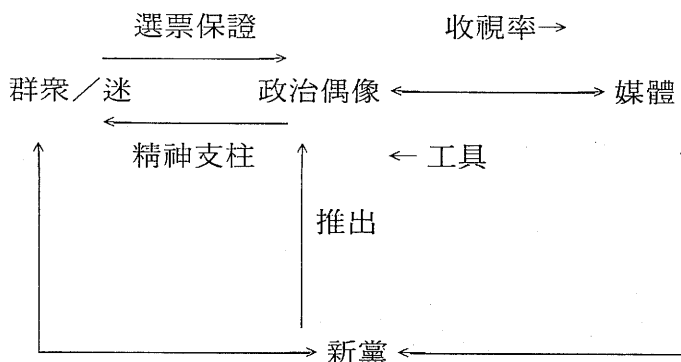
李英明（1994）指出，在台灣快速走向後資本社會中，政黨政治也走向符號意義創造的直銷時代，誰能成功塑造候選人商品，誰就是政治市場上的大贏家。新黨所走的美式選舉模式，正是有別以往組織動員的傳統戰，其透過理念的擴張，來快速吸引選民青睞，所塑造的理念，也符合媒體運作的簡易性、淺薄性，換言之，由「事」的強調，轉為「人」的強調；捨棄政見的冗長不清，強調個人的魅力特色，這也是一般選民只能認知候選人口號，而無法理解政見內涵差異的根本原因。

因此，在媒體行銷的觀念上，新黨與小虎隊並無差別。從形象包裝來強調個人特色、造勢新聞來攀登媒體提高曝光率、到登台作秀來吸引群眾，新黨所塑造的「青蘋果樂園」，正是新秩序下的「保衛中華民國」。而成千上萬的迷眾的瘋狂、激動，以及大排長龍的要求簽名，正是新黨政治人物成功地塑造個人特色，強調個人魅力的偶像架勢。小虎隊為青少年所建構的夢幻世界，正是新黨為中產階級所建構的「Good Old Times」，但其背後的目的，也僅是獲得消費市場的認同，進而獲得金錢／選票。

周智芬（1994：43）曾針對小虎隊的促銷手法，繪製下列圖表：



而就新黨的選舉策略，正可轉化為下圖：



在上圖中，新黨推出政治偶像，必有其事前的調查，評估其在選票市場的佔有率，而政治偶像的推出，必須依賴媒體的形象塑造，除了自行掌握的媒體工具外（如雜誌、有線電視），也透過造勢來突破媒介的封鎖，其原因正是看準媒介講求新聞價值，是否具「賣點」的市場特色。而這也是媒介與新黨在政治層面上相異，卻在經濟層面上共生的關係。

在政治偶像與群眾/迷的關係上，新黨候選人正是作為中產階級心靈想像的投射物，強調其所具有的救贖能力，來換取群眾/迷們的熱烈支持。

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後資本世紀，中產階級由經濟上的定位，到文化上的區隔，其面貌卻是越形模糊。但來自階級的矛盾，使得中產階級產生急欲擁有，卻又害怕失去的保守心態。

新黨的崛起，擺脫了同黨內鬨的陰影，熱烈地擁抱群眾，透過對

中產階級的召喚，來建立己身的政治市場。而作為一個建構虛幻，包裝思想的國民黨舊勢力的新生代，新黨的新秩序能吸納多少中產階級的熱情投入？在台灣本土的地理位置上能涵蓋多廣？以及新台灣人國族的建立，究竟將台灣帶往何處？都有待歷史的檢證及考驗。

歷史殷鑑在前，德國中產階級的出現，及其結局所帶來的悲劇，或許未必是台灣命定之途，但透過歷史之鏡，卻能夠讓台灣島上的人民，在經濟上的成就之後，小心地走出政治上的每一步。

（本論文部份曾發表於 1995 傳播生態學術研討會，交大傳播科技研究所主辦）

## 參考書目

### 一、中文部份

- 王明珂（1994）。中產階級認同不是新黨專利。中國時報。1994/12/06，11版。
- 平路（1994）。新黨在最亂的時代崛起。中國時報。1994/12/02，39版。
- 趙少康、朱高正（1994）。旋乾轉坤，撥亂反正——告台灣省民同胞書。海峽評論。48期，p.12。
- 左又新（1995）。期待新黨的彌賽亞。海峽評論。48期，p.46。
- 吳其諺（1992）。法西斯心態分析。島嶼邊緣。2期，p.106
- 羊曉東（1994）。趙少康升高選舉訴求。中國時報。1994/10/04。
- 李英明（1994）。迎接新的政黨政治時代。中國時報。1994/12/08，11版。
- 李連江（1993）。新保守主義。台北：揚智。p.82。
- 周智芬（1994）。解讀偶像崇拜的社會現象——以小虎隊為例。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學士論文。
- 周陽山（1995）。新保守主義與台灣中產階級。中國時報。1994/11/13，11版。
- 中產階層與反對黨的成長。中國時報。1994/12/06，11版。
- 南方朔（1994）。日據時代台灣的階級結構。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。台北：風雲。
- 張曉春（1989）。中產階級與社會運動。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。台北：巨流。

- 黃毅志 (1994)。台灣地區民衆主觀階級認同。東吳社會學報。第三期，p.265-301。
- 楊 笠 (1993)。要小老百姓過得更好。新國會。1993年9月號，p.30
- 楊泰順 (1994)。新台灣人——選戰中被遺忘的族群。新黨雜誌。17期，p.28。
- Daniel Bell著，趙一凡譯 (1989)。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。台北：久大。
- 福武直著，王世雄譯 (1981)。日本社會的結構。台北：東大。
- 魏 鏞 (1988)。我國中產階級興起及其意義。中國時報。1988/3/23-24。
- 蕭新煌 (1989)。總論：台灣中產階級何來何去？。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。台北：巨流。
- 蕭新煌 (1994)。三黨都有動員省籍和階級的算盤。中國時報。1994/11/28，7版。

## 二、英文部份

- Blackburn, David (1991). The German Bourgeoisie: An Introduction. In D. Blackburn (eds.), The German Bourgeoisie. London: Routledge.
- Childers, Thomas (1991). The Middle Class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. In D. Blackburn (eds.), The German Bourgeoisie. London: Routledge.
- Hamilton, Richard (1982). Who Voted for Hitler?.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- Marx, Karl and F. Engles (1883).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. In R. Tucker (ed.), The Marx-Engles Reader. New York: W. W. Norton & Company.
- Syzmanski, Albert (1983). Class Structure: A Critical Perspective. New York: Praeger.

